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

A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Lee Yi-jun's Novels

林殷醇

EVA LIM YEJUNE

17ALB0049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R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0**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

A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Lee Yi-jun's Novels

林殷醇

EVA LIM YEJUNE

17ALB0049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R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0**

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7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3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3-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7
第二章 对妻职的服从与抗拒	8-19
第一节 婚姻的牢笼	9-14
第二节 婚外情	15-19
第三章 人生抉择	20-29
第一节 独立的女人	20-25
第二节 孤独的女人	25-29
第四章 母女情结	30-39
第一节 母亲	30-34
第二节 女儿	34-39

第五章 结语.....40-42

引用书目.....43-45

附录..... 46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殷醇 EVA LIM YEJUNE

学号：17ALB00498

日期：10/12/2020

论文题目：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

学生姓名：林殷醇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忆著擅于描写女性角色的细腻心理，而这些角色的塑造遵循客观的心理发展规律。本文采取文本细读及心理学解析的研究方法探讨李忆著小说里的女性角色心理，从已婚女人、单身女子、母亲和女儿四个角色类型，解析她们的社会地位、人格发展和人生经历等如何影响她们的心理。

已婚妇女对妻职有着根本敌意，父权要求女人婚后走向生命的内在性，因此敌意化作焦虑，使妻子内心出现私欲与责任的拉扯，最终以婚姻破裂、重归婚姻或自我毁灭的方法结束。另一方面，单身女子也不意味自由，唯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提供人生抉择的自由，一些女人因高度自我效能感开阔人生抉择，一些女人却因社会歧视和精神孤独只能依附男人求生。此外，母女情感也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因素，母亲对女儿带有自我投射和分身式的爱，女儿对母亲有着俄狄浦斯情结，母女之间亦可建立起女性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展现了影响角色心理的三个因素：社会责任、人格尊严和亲密关系，唯有健全的社会、健康的人格尊严和稳定的亲密关系才能保障个体的心理健康。

【关键字】心理、内在性、自我效能、依附心理、自我投射、俄狄浦斯情结

致谢

这篇论文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并非我一人之功，若没有老师、家人和朋友的帮助，此文的产出会困难重重。

首先，我要感谢指导老师许文荣教授的倾囊相助。没有他的引荐，我根本无法接触到李忆著的小说。许文荣老师创建的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更是给予我极大的方便，因为该网站完整收录了李忆著小说的电子版，为我省去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此外，老师也积极启发我的思路，协助我制定论文主题和框架，并在我书写论文的同时，通过线上社交平台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解答我的疑问，批改论文，针对我的论点提出疑问，指导我完善论文。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家长和同学的鼎力相助。疫情期间，由于我住在家乡，难以随时出入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因此父母替我出资买了《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与生活》的最新版本书籍。当我搭火车从槟城回到金宝时，林佩婷同学也慷慨允许我借宿一段时间，并提供交通搭载服务，好让我到大学图书馆借阅参考书，因此我十分感激她的无私相助。

至此，我要向许文荣教授、林佩婷同学以及我的父母致上万分谢意。我衷心感谢他们提供我的一切鼓励和协助，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这篇论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这篇论文的研究动机主要起于笔者对李忆菘小说的女性角色的浓厚兴趣。笔者原先不认识李忆菘，在指导老师许文荣教授的建议下，才去借阅李忆菘的几本小说。笔者在第一次阅读《镜花三段》时，就为李忆菘独特的叙事手法感到兴味盎然。

《镜花三段》分别用母亲、女儿和父亲三个角度讲述从一个分裂的家庭破镜重圆的故事。起初，笔者觉得李忆菘的文字过于简单朴实，故事主题也很“老生常谈”，然而，随着阅读体验的深入，笔者发现李忆菘隐藏在简朴文字背后老练和厚实的文学质感。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笔者对于李忆菘在小说里使用的用语和描写感到异常亲切，她不舞文弄墨，不矫揉造作，笔下的世界皆由日常生活提炼而出，看似简单朴素，却蕴含着作家本人对生活的深刻观察能力，而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都是社会上形形色色女子的缩影，舞女、妓女、情妇、第三者、家庭主妇、寡妇、职业女性……有的角色一生都活在父权社会的阴影里，却始终看不见促成她命运悲剧的社会根源；有的角色原本是传统小女人，在经历了重重打击后，选择化身为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有的角色从头到尾都不肯屈服于父权社会的重压，宁为玉碎，不为

瓦全。而且，李忆著是按照角色自身的社会经历来刻绘出她们的性格和命运的，这就形成一种逻辑自洽的文本张力，使得读者能够和这些角色产生共鸣和同理心。

笔者曾阅读过波伏娃的《第二性》，对女性在父权社会下如何被当成“他者”去形塑、消音、隐身、挖空、撕裂和客体化拥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因此笔者在接触到李忆著笔下的“情妇”、“妓女”、“出轨女”、“第三者”，这些对社会大众来说趋于负面的女性形象时，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摇着道德大旗出来批斗作者和角色，反而是选择以同理心和理性兼具的目光去观察她们面对命运苦难的挣扎和无奈。尤其是那些倚靠男人赖以求生的情妇，放在现实世界里肯定是被谩骂嘲笑的边缘人物，可是笔者试着用不带偏见色彩的眼光去阅读作品时，却能够从李忆著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调下体验到一个渺小不幸的女人历经世态炎凉的痛苦，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不同于喜欢“宏大叙事”的作者，李忆著喜欢描写女性小人物的故事，而这些角色大多都不完美——她们幼稚、偏执、自卑、懦弱，有些甚至是注定被社会边缘和唾弃的群体。然而，李忆著却不是在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审判官视角去书写她们的故事，她的笔调苍凉老练，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把现代社会的女人群像写了出来。因此，笔者被深深地打动了，开始产生了一股想进一步了解她的作品的欲望。然而，也许是因为地域限制的因素，学术界对于李忆著的研究并不多，故笔者决定将李忆著的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研究课题。

李忆著擅于刻画大量社会背景和性格相异的女性人物，本身就展现了她老练的形象的概括能力，这就使得笔者产生了想要运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女性主义

等理论解析这些女性角色的心理的想法。于是，这篇论文的主题和研究方向就这么定下了。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学界对于李忆菽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作品风格和人物形象上。邵德怀在《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菽的小说》当中探讨了李忆菽的作品风格、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她刻绘人物的特点。邵德怀注意到李忆菽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虽然形色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身上流露出一种刚强、爽朗、敢作敢为，对生活和命运有主导权的新时代女性特点。他也表示李忆菽擅长在进行人物塑时揭示某些具体事件包括偶然事件对人的决定性意义。此外，他将李忆菽的作品风格定调为“感伤”和“浪漫”并存。¹

郭建军在《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菽散文品评》对李忆菽的作品美学风格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他提到李忆菽的作品有一种“温婉的感伤”基调，她笔下的故事含有浓厚的沧桑意识和苍凉境界，而这两种美学特点都与她作品中感伤的女性意识相连。在郭建军看来，李忆菽的作品已经从一般狭小的“感伤”过渡

¹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菽的小说〉，《小说评论》1992年第4期，页86。

至旷达的“苍凉”境界了，这是一种东土美学的高华境界，从一种对个体悲惨遭遇的感伤，推及至对世道人心的广博体悟。²

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从李忆著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出她们背后父权中心社会对她们性格和命运的深厚影响力，并发现到身为女性的李忆著，在进行女性书写的时候强调的自省和独立精神³。另一方面，林春美在《李忆著的〈怨女〉与女作家的自觉与不觉》当中，则是用一种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去解读《怨女》。她提出，小说主人公骆凤仪婚前担忧自己嫁不出去，嫁给一个身价比自己低的德士司机后又怨恨丈夫处处不如己，最后更因为自己“下嫁”的丈夫产生婚外情而倍感屈辱，这种社会对大龄未婚女性的歧视，妻子要求丈夫的学历和职业高于己的情况本身就是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之变相实现。而林春美觉得李忆著虽然有表现出这种女性的被父权社会的婚恋意识形态荼毒的现实，但她还是绕开了性别权力冲突的难题，把女主人公刻画成一个厌恶自己的丈夫，觉得丈夫变心是一种“忘恩”行为的偏执女性形象。林春美认为，文本当中这种对“忘恩”的反复强调，以及女主人公偏执的形象，或多或少合理化丈夫的外遇，也因而消解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化批判味道。⁴

另外，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论》和田卓艳的《李忆著〈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和身份认同》则把目光转移到李忆著在作品当中流露出来的民族

²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著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页65。

³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1。

⁴ 林春美，〈李忆著的〈怨女〉与女作家的自觉与不觉〉，《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279。

和文化意识。马峰留意到李忆著本土书写里头的本土意识，他指出，《风华正茂花亭亭》华人男子与印度女子的婚恋缠绵，牵扯到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先进思想的激烈碰撞与矛盾，而《春秋流转》则从一个由华人主导的闭塞小镇，反映出华人群体在马来西亚政治环境下的边缘和疏离。⁵另一方面，田卓艳细细探讨了《遗梦之北》的中国性和本土性书写，并深度挖掘《遗梦之北》对三代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身份认识以及身份认同上的转变的描写⁶。

以上的前人研究分别从李忆著作品的风格、女性形象、中国性与本土性上去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特定方面的阐释，并没有就角色心理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在阅读这些前人的研究后，希望能够将李忆著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心理学、父权社会、社会学等繁杂的背后因素结合在一起，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群像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找出在她们的性格和命运形成背后那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⁵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7。

⁶ 田卓艳，《李忆著〈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和身份认同》（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8），页56-5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用文本细读批评方法来进行研究。文本细读是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并在阐明作品的各种因素的冲突和张力基础上把握这部作品的有机统一⁷。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李忆著的文本上，分析她如何编排故事，解读她在描绘那些女角色的心理时所运用的语言，剖析角色心理发展的因果关系，挖掘角色的内心感受和价值观如何影响她们的命运。

纵观文本，李忆著小说里的女性角色都拥有一些相通的经历、身份、关系与心理矛盾，然而她们在面临个人命运的抉择上却有所分歧。因此，本文先是把四种类型的女性角色——已婚女人、单身女子、母亲、女儿——区分归入三个章节，再去比较和分析这些身份相近的女性角色身上的细微差异，一一探讨她们的心理状态和其他诸如童年因素的外部环境影响，如何形塑她们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抉择，这样就能从微观角度一窥这些女性角色的宏观群像了。

本文将会使用心理学来探究女性角色的形象和性格特征。针对某些涉及到童年早期经历叙述的角色，本文也会采用心理发生学方法进行研究，即运用心理学理论探讨一个角色的早期经验和人格生成⁸，从童年一直成长到现在的心理发展过程，再由此推断出她之所以会采取某些举动的背后成因。本文会运用人格心理学、社会

⁷ 王先霭、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1。

⁸ 王先霭、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117。

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来探究她们的心理。此外，本文亦将引用经过雀朵洛和波伏娃重新解构过的精神分析理论探讨小说里两组母女之间的关系。

李忆著基本都是以女性角色为主来书写细腻的女性感受、女性经验、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她的小说虽然也有许多男性角色，但基本都是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来探讨两性关系的，其中涉及的内容有婚外情、婚姻、爱情、母女情、父权价值观等，所以本文会运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角色心理。这个部分会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分析，因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心理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影响关系，正如波伏娃所说的：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⁹”。文化、历史、教育和社会环境烙印在女性心中，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进而深入到她们的潜意识，影响她们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眼光。“社会性别”这个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¹⁰。故此，以女性的社会性别为核心、延伸探讨父权制定的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等概念，用以解析这些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动如何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⁹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页9。

¹⁰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196-197。

第二章 对妻职的服从与抗拒

妻职是 society 对已婚女人的社会角色要求，主要职责为“相夫教子”。女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与社会规训都在形塑她们成为孩子养育者的社会认知，而这个角色认知训练是由父权体系塑造出来的。父权体制是一个以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为核心价值的社会¹¹，它把女人束缚在狭小的家户领域内，自订性别秩序，强调性别差异，赋予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女人在父权框架下需从属男人，她们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男人是社会的生产者，需要女人来延续物种，因此女人不断被灌输婚姻是她们唯一的生存手段和终身命运的信念，迫使她们受制于生育和家务的角色¹²。违背这项社会规范的女人将会遭惩：单身女子被嘲作“老处女”；不守妻职的已婚妇女被嫌作“自私”。如今的 21 世纪历经女性解放和父权社会解构的女权主义思想淬炼，对妻子的角色要求已不如以往苛刻了，但父权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痼癖和心理积淀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本章将探讨已婚妇女面临妻职的矛盾心理。

¹¹ [美] 亚伦·强森著、成令方等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 23-24。

¹²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200。

第一节 婚姻的牢笼

此节以《怨女》的骆凤仪和《风华正茂花亭亭》的玛妮两个角色作为研究焦点。在探究主题前，应当先解析两位主角在婚前的精神状态和她们对婚姻的态度，这样才能凸显出婚后的悲剧。首先，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行为和反应模式是由他们的自尊、依恋模式和人格属性形塑而成的，这三种类型影响了骆凤仪和玛妮应对婚姻的态度。骆凤仪寡言、内敛、敏感、低自尊和神经质。她虽是个高学历的教师，却时刻自卑于自己大龄未婚的事实。替她物色男人，安排相亲的同事看似好心，实际上却反映出社会对独身女子的偏见，无论女人在个人成就的表现如何，她的终身使命仍是嫁人生子。这种文化将会助长女性的内化压迫，导致她们产生自我厌恶¹³。骆凤仪内化了自己是“不正常”的印象，表现得异常神经质：善变、容易担忧、焦虑和愤怒¹⁴。她也属于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人，表现出回避型依恋的迹象，她性格内向，明明有高度归属需要，却不易打开心扉接纳他人。她的低自尊、神经质和不安全型依恋在往后的失败婚姻里发挥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玛妮是个聪慧、自信、独立、积极、倔强的印度女子。她拥有高自尊，自我概念明确，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她不屑于相夫教子的使命，渴望自我实现，而她极高的自我效能也促使她在学术之路发奋钻研递进，不顾妻职的束缚，坚持进修硕士班。她健全且文化素养高的有钱家庭环境提供她稳定的亲密支持系统，

¹³ [美] 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页 75。

¹⁴ [美] 罗兰·米勒著、王伟平译，《亲密关系》（第 6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页 28。

使她发展出安全型依恋。即使异族爱人周承安的父亲歧视印度人，她也不愿在自己的爱情幸福之路退缩。从以上心理模组分析可以看出骆凤仪和玛妮在婚前的性格是天差地远的，后者的心理远比前者健康，然而，为何两人却在步入婚姻后殊途同归，走向婚姻破裂和自我毁灭的道路？

首先，两人虽愿意结婚，潜意识却存在着对妻职的深沉厌恶和抗拒。波伏娃说：“许多女人之所以决定结婚，是因为她们知道婚姻是女人唯一的理智出路，她们想过妻子和母亲的正常生活，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隐秘而执着的抗拒，阻碍了她们从婚姻生活找到幸福的平衡。¹⁵”现代社会虽然承认女性的职场价值，但家务和育儿依旧是女人的份内之事，除非有能力承担家庭工作双负重，否则许多已婚女人必须在家庭和职场二选其一。玛妮正是面临这种困境。为了迎合华人家庭“好媳妇”的标准，她每天帮忙全家洗衣服、熨衣服，想表现得勤俭懂事，然而，她不愿放弃硕士深造的机会，因此她提出若丈夫和自己都要留学深造就把孩子交给婆婆照顾的要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建构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框架：男性是超越性的，女性是内在性的。她指出，婚姻本质上并不激励女人同男人一起向世界超越，它把她禁锢在内在性中，女人的世界就是她负责管理的家庭四壁之内¹⁶。玛妮虽尽量扮演好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但她生性奔放自由，热爱学术且野心勃勃，不愿就此牺牲前途，放弃个人对世界的超越，步入家庭的内在性。

骆凤仪则没有玛妮这么独立有主见，她的婚姻本质上是想缓解情感孤独和抵消身为“大龄未婚女”的屈辱。她的不安全型依恋使得她比一般人更抑郁易虑，具

¹⁵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211。

¹⁶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235。

有强烈的亲密关系归属需要，害怕孤独生存的焦虑。她的婚姻和身份认同都是建立在她由焦虑引发的自我防御机制的基础上。为了摆脱焦虑，她选择合理化女人相夫教子的使命，接受了身为妻子和母亲才是“健全女人”的身份认同。尽管认为自己和胡叔源的阶级地位差异太大，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然而，她的焦虑没有得到充分缓解，加上她的神经质性格，导致她怀孕后终日忧惧恐慌。这个胎里的生命她不了解，却又寄生在她的体内，使她感觉自己是个“生命的被动工具¹⁷”。那个寂寞却独立的自己也逐渐被陌生的内在性身份所取代——妻子、母亲……而丈夫不理解她的不安。

此外，骆凤仪和玛妮对丈夫的爱恨交织态度也激起她们对妻职的怨恨和失望。这两个女性都是高等学历的知识份子，拥有一定的经济自主能力，但她们的丈夫却在学历、学识和阶级上皆不如妻子。父权社会赋予男人的性别角色是家庭的栋梁和代言人，凡事不如妻的丈夫是失败的。在父权压力之下，胡叔源和周承安都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情结，胡叔源是中学没毕业的德士司机，周承安是没钱上大学的税务局小职员，他们都对妻子的成就和阶级感到嫉妒和耻辱。父权要求妻子屈从丈夫，于是两位女人不得不安抚丈夫的男性尊严。明明生活会因而变得拮据，胡叔源却要求薪资远高于己的妻子在孩子出生后辞退工作持家育儿。周承安一直在存钱准备出国留学，然而当玛妮提出想让父亲资助他时，却责怪玛妮损害他的男性尊严。玛妮屡次安抚他，提出让父亲津贴家庭两人专心读书的建议，但他还是严词拒绝。其实，明明妻子的经济状况不差，只要夫妻互相尊重和同心协力，所有家庭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但两位丈夫碍于父权压力硬要独揽家庭重任，间接滋长妻子的不满。

¹⁷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20。

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提出，压抑敌意将会招致焦虑，而受压抑的敌意往往具有极大的爆炸性，一旦爆发将会导致空前绝后的灾难¹⁸。骆凤仪和玛妮在婚姻的屈从地位中积累诸多不满。周承安在玛妮说要读硕士班时相当不快，他认为把孩子丢给自己母亲的玛妮是“城府深”和“自私”的，但他却从未想过准备出国留学的自己也是“自私”的。父权社会让丈夫的生涯发展成为优先考量，而让妻子的地位居于次等，让女人的生命以育儿为优先，而男人却可以将育儿视为次要任务¹⁹。玛妮终日沉醉学术的生活方式更是令周承安不快，他不尊重妻子的感受和成就，只在意对方有没有尽到妻职的责任。玛妮的安全型依恋一开始有助于她适应夫家的华人传统家庭，迎合夫君的大男子情结，但是，她的高自尊不容许婚姻牺牲自己的理想抱负。她珍惜自己的事业成就和精神生活，无奈妻职本身就是和女人的内在自主需求形成强烈冲突的。夫妻俩数次爆发争执。承安遗憾玛妮完全不是理想贤妻。

为了维护婚姻，玛妮压抑对丈夫的敌意冲动，几次争吵后，还是尽量迎合丈夫，扮演好妻子的角色，但她始终不甘于妻职的内在性命运，不断产生反射性的抗拒，导致她的行动反复无常，一时充当好媳妇，一时全心投入工作。就这样，压抑许久的负面情感能量彻底把玛妮的性格转变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她在婚姻后期开始报复丈夫，经常借故跟他吵架，挑三拣四地用不堪入耳的话来羞辱他²⁰，践踏他的男子气概。玛妮逐渐意识到婚姻摧毁女人，迫使她们牺牲自己，过着局限于家庭

¹⁸ [美] 卡伦·霍妮著、冯川译，《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页 48-49。

¹⁹ [美] 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页 144-145。

²⁰ 李忆著，《李忆著文集》（福建：鹭江出版社，1995），页 71。

的重复和前篇一律的生活²¹。只要还困在婚姻的牢笼中，她的斗争就是没有意义的。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中，玛妮长期压抑的积怨、焦虑和强烈敌意如同火山般以骇人的破坏性爆发出来，她怒提离婚，索讨女儿的抚养权，以报复性的姿态摧毁掏空这场婚姻。她要承安感受同时失去妻子和女儿的痛苦，嘲笑他苦苦经营的婚姻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当然，代价是玛妮本身也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离婚后她变得精神错乱，感觉生活失去意义。一段婚姻就这么毁了她。

如果说玛妮婚后才发现自己是困兽，那骆凤仪在婚前就已是奴隶了。她看似比玛妮更愿意接受和内化性别歧视观念，但心理终究是痛苦失调的，婚后更是完全抹杀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亚伦·强森指出，任何体系都有阻力最小的路，人们很难不去遵循，父权体系就是一种社会，它为女性铺排了一条道路，逆道而行需要冒极大的风险²²。骆凤仪在婚后很快就投入妻子的内在性命运也是基于她不安全型依恋和自卑胆小的人格，她没有抗争的勇气，因此选择以麻醉自我的方式逃避焦虑²³。她在儿子出生后毫不留情地辞退长达十几年的教职和阅读兴趣。她已完全没有了她自己，孩子已是她的全部生命²⁴。父权将妻子定位在家庭内，要求女人在婚后与过去决裂，全心奉献家庭。骆凤仪感觉自己嫁作人妻后失去了对世界和未来的控制力，她对丈夫在产前的疏远态度耿耿于怀，意识到婚姻不能让她产生被爱的归属感。她想通过孩子去弥补内心的不满和空虚²⁵。而她的神经质人格使得她对儿

²¹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297-299。

²² [美] 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页 134-135。

²³ [美]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页 35。

²⁴ 李忆著，《痴男怨女》（吉隆坡：学人出版社，1990），页 194。

²⁵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42。

子灌注几近疯狂的溺爱，她“终日神经兮兮的，差不多廿四小时都守着儿子²⁶”，唯恐失去他。

此外，骆凤仪在生出儿子后，像丢脏抹布般把丈夫弃之不顾了。她不关心胡叔源，不再为他准备食物，也对肉体接触失去兴趣，只把他当作赚钱养家的工具。她原先就对丈夫存在积怨，只是为了婚姻忍耐着，有了儿子这个情感代替品后，更加觉得他是多余的。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缺点比优点更有影响力²⁷，此前她孕吐不适和出现产前抑郁症状时，胡叔源都不怎么关心，这使得敏感多疑的骆凤仪放大丈夫的负面印象，加上她原先本就瞧不起丈夫，最后失去了对他的爱。妻子的冷漠使得胡叔源寂寞又愤怒，他到外面找女人，还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当他向骆凤仪提出离婚时，她气得发狂，盛怒中赶他出门，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疯狂姿态。她感觉自己被背叛了，不过这种背叛引发的痛苦非源于她对他的爱，而是这个德士司机胆敢“忘恩负义”！她“屈尊下嫁”给他，为了妻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兴趣、主体意识与人格尊严，结果他却回报背叛。最后，她在万念俱灰下不顾儿子吞药和割腕自杀了。

²⁶ 李忆著，《痴男怨女》，页 191。

²⁷ [美] 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页 410。

第二节 婚外情

自古以来，东方传统社会都把婚姻当成一种维护宗法社会关系的制度和义务，直到现代，爱情都是不被重视的，中华文化强调家庭稳固和婚姻形式不可被轻易毁坏观念，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一旦婚姻家庭产生裂痕，一种道德的义务和责任感便驱使人们为其重新稳固而奔走²⁸。这种古老观念影响之深刻，以至直到如今离婚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耻辱之事，更不用说铁定会导致身败名裂的私奔之举了。《镜花三段》的舜涓和《梦海之滩》的胡真真都是三十几岁的已婚妇女，按照社会对女人的标准与期待，她们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有夫有子坐拥中产阶级美满家庭的女人，她们已完成父权定义的“女人使命”。然而，婚姻是现实的，当爱情消退，婚姻就会变成煎熬，而舜涓和胡真真偏偏爱上别的男人。

首先，她们的婚外情人都是有魅力的大龄单身男子。何祖昌外貌英俊、大胆进取、事业心强烈，拥有高度成就需要；陶伟是个事业有成的银行贷款部经理，他阅历丰富、教养良好、饱经世故，稳重中带有迷人的负气和骄傲。他们在求爱时都展现了热烈、激情、愿为爱情远走高飞的主动性一面。她们的情人选择都印证了波伏娃说的一句话：“往往她喜欢他是因为他属于和她丈夫截然相反的一种人。”²⁹她们的丈夫都是符合社会标准的好男人，陆以哲是个温和内敛的“钻石男人”；史

²⁸ 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 3-4。

²⁹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89。

荣生是个温柔体贴的医生，他们事业有成，顾家爱妻，性格方面与情人截然相反。如果说胡真真和舜涓与丈夫的感情是趋于平淡的，那么她们的婚外恋就是轰轰烈烈和大胆刺激的，她们分别在情人身上找到一种唤起年轻激情的狂热之爱，其特征是充满爱欲幻想、占有欲强、难以满足³⁰。这种私情极大满足了舜涓和胡真真嫁作人妻后再也体验不了的狂恋激情和禁忌刺激之感。然而，她们在快乐之余，却也产生深深的罪恶和羞耻感，两人在妻职责任和私情快乐间面临痛苦的内心纠葛，而她们的性格和应对婚姻的态度却使得她们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在遇见陶伟前，胡真真是个完美的贤妻良母，她保守谨慎、温柔善良、贤良淑德、持家爱子、循规蹈矩。她完全接受父权观念，努力扮演好妻子的社会角色，认为贤妻良母是对女人的最高赞礼。在传统男权社会中，衡量女性是否幸福以及她的人生价值的尺度主要取决于她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她的婚姻是否美满和稳定³¹。虽然现代女性已经可以在职场证明个人价值，但对胡真真这种家庭主妇而言，个人价值终究只能与婚姻家庭相连。她把全副身心奉献给家庭，自认是个“极幸福的女人³²”。另一方面，舜涓性情比较大胆奔放，骨子里相当叛逆且自我意识强烈，她虽然愧疚自己没尽到妻子母亲的责任，但还是不愿牺牲自己的爱情。她不是传统定义的“正统女人”，比起家庭更重视个人快乐，对爱情充满渴望，为了私情狠心抛夫弃女。

³⁰ [美] 罗兰·米勒，《亲密关系》（第6版），页269。

³¹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页101。

³² 李忆著，《梦海之滩》（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页37。

如果说舜涓是公然叛逃妻职，胡真真就是潜意识里存在对妻职的隐秘失落和抗拒，这种压抑的情感直到她婚外恋后才浮现：“难道我是对自己的家庭充满怨怼的吗？”³³事实上，妻子再怎么自我催眠，妻职本身就是父权社会对她们设下的沉重枷锁，它要求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为他打理家庭和延续后代，牺牲自己的主体意识，并把这些压迫合理化为“妇道”，许多女人从再怎么认同这些价值观，内心仍存不满。胡真真一直在奋力迎合社会期待，想做一个人人称羡的贤妻良母，但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她是没有自己的³⁴”，妻子的附属地位终究只能带来无尽的空虚，因此当她遇到陶伟时，“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不太确定的意识事实上是有着某种企盼，似乎要还原些什么³⁵”。胡真真发现自己过去的奉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如此狭隘，她丢失了自我实现的梦想和价值，感觉自己困在内在性的空虚，因此私情成功带来新生命的活力。陶伟自信进取的魅力令她心动，他主动提出要载她、请她吃午餐、到他家作客，并告诉她：“我给你带来新的感受，新的生命力量和目标。³⁶”爱情填补了她的内心空缺，她感觉自己摆脱了妻子的身份，重新体验到只针对她个人的被爱感觉，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出轨的女人需要仍然充满神秘的眼睛发现她是神秘的；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面对着她，重新激发褪色照片的活力，因为她丈夫的注视过于习以为常，再也不能激发想象。³⁷”

舜涓倒是简单得多，她的本性是反骨的，没兴趣当贤妻良母，对女儿的爱更多是一种不含社会道德义务的纯粹母爱，对何祖昌的爱则出自纯粹的快乐，所以她

³³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23。

³⁴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5。

³⁵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6。

³⁶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27。

³⁷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85。

才胆敢不顾舆论，抛夫弃女。她不想维持一段没有爱的婚姻，只想追求爱情的快乐和满足。虽然舜涓和胡真真是相反的人格类型，但她们的内心还是饱受道德谴责，毕竟她们身处集体主义的华人社会，集体主义文化倡导互依的自我建构，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动的影响³⁸，所以她们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陶伟不顾世俗眼光，屡次要求胡真真跟他在一起，但懦弱保守的胡真真对这份畸恋惶恐不可终日，终日以泪洗脸，活在罪恶感的折磨中；舜涓与何祖昌私奔到英国后，经常闷闷不乐、沮丧和患得患失。她们都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女人。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胡真真和舜涓经历了“本我”和“超我”的冲突。她们的“本我”受快乐原则支配，体现在想抛弃一切跟情人在一起的浓烈欲望，而“超我”表现在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这两种意识之所以会激烈冲击，是因为违抗社会期待会付出巨大代价，出轨的女人不仅会遭受严厉的文化谴责，身败名裂，还会破坏婚姻家庭。区别在于舜涓虽然私奔后很愧疚，却还是认为满足“本我”的快乐是没错的，而胡真真终究不愿放弃责任，也没有勇气承担舆论非议。她的“自我”为了调节“本我”和“超我”的冲突，答应和陶伟度过最后一夜（吃晚餐和做爱）后，就此忍痛割断这份不光明的私情。另外，舜涓比较自私，她抛弃丈夫和女儿不闻不问整整十二年，这种行为带给他们很大的精神伤害，胡真真则是万分不愿伤害丈夫和孩子。

³⁸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等译，《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页450。

婚外情只能帮这两位女人摆脱主妇生活的束缚，不能带来真正的个人尊严和自我实现。情人或许能满足她们的情欲渴求和快乐之情，却无法让她们摆脱依附男人的心理。胡真真感觉两头不到岸，和陶伟在一起也是绝路，因此她宁可回到风险更少的“正轨”；舜涓私奔后，感觉“不过如此”，她必须依赖何祖昌才能生存，因此心存两人爱情淡去后自己何去何从的心理包袱。所幸的是，她通过工作找到独立价值。

第三章 人生的抉择

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是拥有独立人格的完整个体，主体意识向世界超越，而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和他者，男性通过女性确立自身，女性却从小被诱导要走向一条舒适的、寄生虫般依赖男人的道路，这种幸福的代价便是牺牲她们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变得异化和被动。

现代社会历经层层近代西方思想冶炼，已经大大改善了女性的处境。女性获得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也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这么一来，女性人生抉择的道路就从狭小的家户领域扩大至这个愿意开放给她们改造和超越的世界了。当然，社会和思想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许多女人心中还是留存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本章节探讨社会、思想和人格特质如何影响单身女性做出人生抉择。

第一节 独立的女人

此节以《镜花三段》的舜涓、《马的英姿》的杨瞬瞬和《女人》的刘正美作为研究目标。在三人之中，只有杨瞬瞬年纪最轻且没有经历爱情，其他两人都是经过离婚和失恋才重新单身的中年女人。这三位女人拥有不同的性格。杨瞬瞬乐观、

积极、理想、灵敏、潇洒，怀着对世界和全人类的热忱；舜涓精明能干、大胆自信、处事老练；刘正美淡定沉静、理智清醒、自得其乐。然而，她们仍然共享两个核心特质——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她们都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的目标、信念和人生哲学，并且能够从自身理想、事业和人生中体验到充盈的自我价值感。下文将逐个分析这三位不同类型的新时代女性。

在三人之中，舜涓是大器晚成的类型，她曾经拥有女人该依赖男人的观念，直到投身事业后才发展出独立的人格和高度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对自己能力与效率的乐观信念可以获得很大回报的理论³⁹。和祖昌私奔到英国后，舜涓的生活起居全靠他养，她负责在家做家务。起初她持有“既已跟了他，做附属品也是必然的事⁴⁰”的消极思想，自我安慰要知足常乐，但驱使两人私奔的毕竟是易变的爱情，如果祖昌移情别恋，那没有经济自主权的她就成为流落异国他乡的孤家寡人了。何况她是个不易满足现状追求新鲜感的人，所以她决定投身工作，启动时装精品店的事业，该举动把她从家务的内在性抛入工作的超越性，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

按照人本主义理论，人类的主要任务是使自身的潜能得到不断的发展⁴¹。人本主义强调自我实现的驱力，而自我实现是指个体不断努力开发自身才智与能力，实现个人内在潜能的倾向⁴²。随着舜涓的生意越做越大，她越发自信，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实现欲望也随之拔高，把人生目标从爱情转换为更上一层楼的事业成就。通

³⁹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页 56。

⁴⁰ 李忆著，《镜花三段》（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页 26。

⁴¹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 19 版），页 12。

⁴²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 19 版），页 438。

过工作，她看到自身的无限潜力，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等待她超越，意识到“一个女人除了爱情和男人以外仍可以有其他的⁴³”。

其实，舜涓本就是个大自我的人，否则她就不会顶着舆论风波抛夫弃子追求个人快乐了。但那时候的她毕竟只是个自私、沉溺爱情幻想且依赖男人的小女人，唯有工作才能把她的大自我品质转变为独立自信的人格。职场经历不仅帮她建立自我价值感，还磨练了她处事不惊的韧性，使得她在面对祖昌出轨时，虽感屈辱，却并未就此一蹶不振，而是毅然离开他，寻找新生活。可以说，工作不仅给予舜涓精神和物质上的独立，也帮她开阔人生抉择，找到生存的意义。

《女人》的刘正美跟舜涓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是在爱人出轨后果断与他断绝关系，成为单身女性。刘正美的丈夫在外有女人，她选择体面的离婚，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高贵之举，因为她很清楚世界是现实的，爱情不可能永远长久。张绍平断定她离婚后很寂寞孤独，所以不愿应邀当编辑，其他人也对她产生离婚怨妇的偏见，但她却啼笑皆非地表示她一个人活得很自在。她没有杨瞬间的理想，亦没有舜涓的大胆，却带有一种怡然自得和神闲气定的坦荡风度，处之泰然地面对人生困境，享受孤独的自由。

这种自由独立的性格源自她的安全型自尊。安全型自尊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内部特质，而不是外貌、金钱、他人看法等的外部因素，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较为健康⁴⁴。刘正美拥有明确的自我概念，深知自己的缺点、优点、兴趣和生活方式，她自认没有崇高的生存目标，不吝于承认自己的“俗气”。

⁴³ 李忆著，《镜花三段》，页 35。

⁴⁴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页 54。

虽然羡慕好友唐文青的精明能干，却没有因而自卑，因为她清楚“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没必要牺牲本性迎合大众标准。她重视自己独立生活和精神自由，没有因为离婚而痛苦终日，也不将婚姻当作女人的幸福归宿，这些内心强大的表现都源自她的安全型自尊。

而且，刘正美也通过开办旅游社找到幸福的平衡，朝九晚五的生活尽管疲惫，却带给她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磨练她的业务水平。遇到奥客时，也能心平气和，老练地化解困难。经济自主权保障了她的人生，也提高了她的成就需要。成就需要反映了在实现个体目标的计划和工作重要性方面的个体差异⁴⁵，刘正美原本是个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靠前夫的钱过活，通过创业才提高了成就需要。

此外，刘正美也有着高度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的总体评价⁴⁶。满足归属需要，并与另外两种人类需求（自主感和能力感）保持平衡，通常就会带来深深的幸福感⁴⁷，刘正美有着好友唐文青的亲密关系支持，加上创业带来的满足，使她体验到生命的充盈感，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接下来，本文将讨论《马的英姿》女主角杨瞬间的心理。

杨瞬间的独立坚强人格是小时候照顾双腿畸形和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培养起的。她通过妹妹的病痛看见人类的苦难群像，孕育出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她不像一些女性把嫁人当作人生归宿，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立志要成为残废儿童学校的老师，帮助不幸的孩子。波伏娃认为，只有当每个人将荣誉置于两性差别以外，置

⁴⁵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页374。

⁴⁶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页392。

⁴⁷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1版），页388。

于自己自由的生存难以达到的荣耀中的时候，女人才能将自身的历史、问题、怀疑与希望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与希望等同⁴⁸。正是在这个允许女性改造世界的现代社会，杨瞬瞬才能融入人类的共在，将自我抱负与世界等同。

此外，杨瞬瞬的自我效能感很高，也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和自我实现能力。她有才干，有壮志，却不卑不亢，不急不燥。她经常告诉学院的何老师：“我的生命还没有开始。⁴⁹”，因此他万分欣赏这个充满自信与理想的女孩。申请联合国的残废机构工作不成功，她不灰心，一边教儿童绘画，一边勤学语文，等待机会。患上绝症后，尽管悲伤不甘，感叹壮志未酬，但没有绝望等死，而是搬出去独自居住，申请当导游，努力过正常人的日子。明明理想和后半生完全被疾病销毁了，她却没有任何自怨自艾，放弃对世界的热忱，而是趁着余下时日当导游到处游览风景，赋予自己一个体面的生命告别仪式。这种乐观坚强的意志源自她的内控型个性，内控型的人倾向认为命运是由自己来控制的⁵⁰，尽管死亡早已注定，但她仍不屈服于残酷的命运。

杨瞬瞬喜爱画马。她说：“万里奔驰，自由的象征。⁵¹”奔驰的马儿象征她那迎风向上和自由不羁的灵魂。她将此画作为遗物留给何老师，也是想告诉世界：她的自由灵魂没有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湮灭！李忆著没有用悲剧的笔调结束故事，杨瞬瞬留给何老师的不是命运受害者的形象，而是茫茫人海中一个值得纪念和敬佩的独立不群灵魂，她也借着何老师看见一群在夕阳金光中奔腾跃动的马的幻象，浓墨

⁴⁸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578。

⁴⁹ 李忆著，《女人》（马六甲：学人出版社，1982），页 126。

⁵⁰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页 57。

⁵¹ 李忆著，《女人》，页 125。

重彩地刻绘出一个女性对生命的自我超越，就像结尾说的：“马的英姿依然，那是肯定的。⁵²”

第二节 孤独的女人

有的女人通过工作扩张人生抉择，有的女人的工作却将她们困在人生绝境。本节将以两位“风尘女”——《新山夜》的黛媚和《丽娜》的丽娜作为研究目标，探讨她们遭异化、物化和客体化的孤苦心境，以及她们无可奈何的人生抉择。

首先，两位女性都是以艺术才能、肉体、美貌和魅力作为生存资本的女人。黛媚是辗转夜总会、酒廊、酒楼的歌女，丽娜则是在舞厅表演的舞女。区别是丽娜的职业牵涉更多色情低俗的元素，所以她的职场被形容为妓院般的“火坑⁵³”。黛媚歌唱的曲目主要是些靡靡之音，尽管她的表演性质看似比丽娜“高端”，但两人本质都是靠美色吃饭的，需要男人像商品一样相中她们才能保障生存，换言之，她们都是遭异化和物化的肉欲客体。

波伏娃曾指出男人的伪善：“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认她。⁵⁴”虽然黛媚和丽娜不是妓女，但也相去不远——丽娜每天都被舞厅里的男人搂搂抱抱，黛媚年轻时身后追着一群纨绔子弟、丧偶失婚男

⁵² 李忆著，《女人》，页 154。

⁵³ 李忆著，《女人》，页 165。

⁵⁴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94-395。

人和糟老头——本质上都是供男人发泄欲望的客体。然而，尽管男人为她们如痴如醉，但这并不代表她们拥有真正的人生自由和个人价值。恰恰相反，她们没有人的权利，在她们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⁵⁵。她们是受社会鄙视的群体。

有一次，黛媚在酒廊被一个男人拉住企图猥亵，当她表示拒绝时，却被他高声羞辱道：“若真的那么矜贵，就在家里享福啊，何必这把年纪了也抛身出来捞这么沦落？”⁵⁶黛媚虽羞愤委屈，却没有反驳的立场，只能跑到休息室痛哭。丽娜被七十岁的富豪“救出”舞厅，花大钱包养，旁人说：“以她这样的出身，她会有什么损失？”⁵⁷由此可见，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卑贱的，可以被某个男人宠上天，过着不愁吃喝的生活，也可以像蟑螂一样供人践踏。黛媚和丽娜正是因为被社会拒绝才会愁绪满怀，缺乏归属感，因而陷入自卑和抑郁的负性思维模式，导致孤独。

归属需要是与他人建立持续而亲密关系的需要⁵⁸。人是社会动物，缺乏亲密关系或遭到社会拒绝，便会焦虑、沮丧和孤独。黛媚和丽娜的孤独之处在于她们被社会排斥，而丽娜更是经历童年创伤，她从小被父母遗弃，过得凄惨孤苦，没受过什么教育，没人关心她，没有任何亲密关系支持系统。这种没有得到悉心照料的孩子会养成不安全型依恋，害怕被遗弃，缺乏归属感，孤独万分，感觉世界处处都是危机。

十六岁时，为了生活，丽娜沦落风尘做舞女，不断接触那些垂涎她美色，把她当作肉欲对象的男人。后来，她被一个老年富豪包养，虽然在他之下可以吃好住

⁵⁵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95。

⁵⁶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160。

⁵⁷ 李忆著，《女人》，页 157。

⁵⁸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 11 版），页 388。

好，穿金戴银，得到一流的物质享受，对方却极少见她，也仅把她当作满足性欲和炫耀权势财富的工具。最可悲的是，原生家庭获悉她被包养后就跑来相认，嘴巴上说是亲骨肉，实际上却对她的过往和未来都不闻不问，只把她当摇钱树利用。种种的人际关系伤害令丽娜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因此，她才会产生强烈的归属需要，渴求和珍惜她与小说作者的友谊，经常致电和约对方出去倾心相谈。对方不仅填补她的归属需要，也是她人生唯一愿意理解她的人。当然，她没有因而褪去孤独之感，因为对方不能帮她走出人生困境。

接下来，本文将论证两位女性的有限人生抉择如何导致她们的自卑抑郁心境，这种心境又是如何加深她们的孤独。社会心理学认为，抑郁、负性思维和孤独是相互作用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恶性循环⁵⁹。对这两位“风尘女”来说，唯有凭自身姿色受男人的承认和恩宠，才能提高个人价值和经济水平。丽娜年纪小，生活困窘，没受教育，只能通过舞蹈和外貌来赚钱，但她被富豪看中后，就过着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黛媚年轻时在夜总会驻唱，风情万种，美貌绝伦，被男人万众拥戴，有的甚至为了追求她而倾家荡产。然而，这种日子终究是不安全的。

波伏娃说：“美貌是脆弱的珍宝。⁶⁰”，当她们走上这条出售姿色的道路时，就注定走入人生窄巷。黛媚年老色衰，风光不再，男人嫌弃她的年龄，她的表演也远没有年轻女孩的劲舞吸睛。为了谋生，她只能艰辛辗转夜总会、酒廊、酒楼等唱歌二十年，有得唱便唱，还得忍受他人对她的嘲笑和非议。如此辛酸和落差，让她

⁵⁹ [美]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11版），页524-530。

⁶⁰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413。

终日陷入凄凉惆怅、感怀身世、哀叹年华已逝的抑郁心境⁶¹。她深知自己时日不多，“一个女人能挨过几个二十年？”⁶²，这种吃青春饭的活儿早已断绝了她的人生后路。于是，自卑和抑郁心境导致负性思维，使她觉得人生黯淡，生活无望，负性思维又导致抑郁心境，使她终日感伤风光不再，无人可依，进而陷入孤独的泥沼。一方面她卑微的社会地位遭人冷眼，一方面她在熟知的领域又即将被淘汰。因此，黛媚产生强烈的归属需要，只能把希望投注在莫英冲身上，盼望他能够给予她幸福。然而，这样的愿望终究是可悲的，因为她仍需透过男人来寻找个人价值和幸福归宿。由于她没有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心理，因此她不能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做不出更具有个体超越性的人生抉择，只能困在等待男人宠幸的被动和物化状态，进入孤独的长夜。

黛媚的悲剧其实就是所有“风尘女”命运的缩影，她甚至算不错了，至少还有一把好歌喉，其他的女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丽娜现在看似“幸福”，但她不识字，教育程度低落，一旦富豪死了，或者年老色衰了，还有什么生存手段呢？这就是小说作者劝她趁年轻去学个本领，为自己争取精神和物质独立的原因。然而丽娜却消极的拒绝了。在生存焦虑和成为附庸的两难中，她选择后者，宁可成为男人的玩物，也不想再度忍受独自生存的恐惧。

她的生存意志之所以如此脆弱，除了没有健全的亲密关系支持系统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童年和舞女生涯被边缘化和异化的精神创伤。精神创伤使她自尊低落，自我效能低，缺乏自我实现能力，认定自己天生就是“孤月难明”的命，人

⁶¹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162。

⁶² 李忆著，《梦海之滩》，页 162。

生抉择之路只有“寻找主子”这一目标。包养她的富豪让她少说话，别献丑，她就乖乖地除了劝酒什么也不说，简直像个宠物，毫无独立人格和尊严。

这种异化的人生使丽娜陷入自怨自艾的负性思维模式，再奢靡的物质生活也填补不了她心灵的孤独。其实这也是物质主义世界的无奈，所谓幸福源自于脆弱的财富权势，灵性生活始终次于物质需求之下，人们没有强大的精神信仰支持孤独的心灵。丽娜每天呆在高级豪华公寓里，寂寞难耐，因此她极度渴望小说作者的陪伴。然而，只要丽娜没有自己踏出那一步，把自己确认为主体，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她就只能被动地等待命运的主宰，始终无法拥有遭奴役的他者以外的人生抉择。

第四章 母女情结

李忆著在小说里描写了很多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细腻情感，其中的母女情结不仅是骨肉亲情，还牵涉了女性认同、社会性发展阶段、生命意义和原初关系等的深刻内涵。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互相扶持帮助才能生存，自然界赋予人类母爱和父爱的本能也是出于让他们繁衍后代、抚育小孩和保障小孩生存的动机。从母性到母爱到母职，其中又夹杂了人类内在精神需求和社会影响的因素。至于女儿对母亲的爱，除了有女性认同因素外，还有一种俄狄浦斯情感。本章节即是针对《镜花三段》舜涓和明明、《春秋流转》孙桂娘和颜令冰两组母女之间的关系做研究。

第一节 母亲

本节以两位母亲舜涓和孙桂娘为主要角色，剖析她们对女儿的母爱情感。舜涓和孙桂娘的母爱性质本质是一样的，但母职动机和母爱角色略有不同，这是因为俩人的身份、人生经历和养育女儿的时间相差甚远。舜涓经历了母亲到私奔小女人到独立女性的人生三变，她照顾女儿明明的时间只有短短五年而已，后来与情人私奔到英国去，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回来见她。孙桂娘则是打从一开始就待在女儿颜

令冰身边，直到她成年还不离不弃。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俩人在面对女儿表现出的母爱性质也有所不同，因此下文将会把两位角色分开来解析。

波伏娃和兰西·雀朵洛曾提出母亲对儿子和女儿的母爱是有差异的论点。波伏娃指出，异性恋母亲把儿子当成一个男性客体，而她在女儿身上却是在寻找自己的分身，重现自己的身份和经验，从中认出自己，超越自己⁶³。雀朵洛认为，母亲不会像对待儿子一样将女儿视为与自己区分开的他者，由于自己也经历过女孩的阶段，所以她和女儿之间会保持一种持久的一体感，和女儿的原初认同与共生状态比较强烈，带有一点自恋因素⁶⁴。总结而言，母女之爱是带有强烈的女性认同要素的。

这种女性认同的母爱体现在孙桂娘对颜令冰和红莲的情感上。孙桂娘曾是贤淑沉静的女人，嫁给颜医生后，因长期的夫妻不合及赵静娴的谩骂诅咒，变得暴躁易怒，絮叨成癖，怨天怨地。她对令冰的态度看似不耐烦且嘴毒，但这只是嘴硬心软的表现。令冰幼时病重，她抱她去拜观音求灵符，康复以后每年观音诞都会去上香；令冰生病时，威胁下次她在下雨天乱跑就会打断她腿。甚至为了维持这个家，多次对早已不爱她的丈夫忍辱负重，这些行为都看出她对女儿的深沉母爱。

起初，孙桂娘没有和令冰建立起女性认同，因为她觉得孩子太小不懂事，所以她把女性分身的母爱投射到已是少女的红莲身上。她十分疼爱丧母的红莲，待如己出，经常向她抱怨家庭问题，并教导及分享自身的女性体验，比如有一次她劝红

⁶³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47-349。

⁶⁴ [美] 兰西·雀朵洛著、张君玫译，《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 139。

莲要谨慎嫁人，因为“女人的一生幸福全操纵在男人的手里。⁶⁵”，而这些事情她是绝不会跟令冰分享的。甚至后来发现红莲跟丈夫约会，孙桂娘不生气，反而劝慰她，责怪颜医生的无耻。她把自我投射到红莲身上，感到女性身份像一种绝对的诅咒⁶⁶，怜悯红莲会如同当年的自己一般遭到残忍的小镇居民荡妇羞辱和恶毒中伤。她这份自我怜悯的母性光辉通过她紧紧抱着投河未遂昏迷的红莲的动作当中具象化了。

后来，家庭的剧变使孙桂娘在令冰身上找到一种全新的母爱角色。红莲失踪后，颜医生对孙桂娘的恳求始终采取冷峻且不理不睬的态度。相反的，年纪小的令冰却在这段黑暗岁月给予她充足的精神支持，让她意识到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她们之间产生一种相依为命、血脉相连、患难相共的母女同理心情感。最终，母女俩离开颜医生远走高飞，投靠到表姐家，过着平静的生活。孙桂娘对令冰的态度变得温柔慈爱，她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女性共同体、原初认同与共生的状态⁶⁷。

孙桂娘对令冰的女性共同体和同理心母爱还体现在令冰长大后持续给予女儿支持。令冰的丈夫出轨，她主动提出离婚，一人照顾孩子，孙桂娘感叹女儿与她殊途同归，滑向不幸婚姻的命运，所以辞退工作搬过来帮忙照顾她的儿子。自从她们家破人亡后，这个女儿就展现了成熟和稳重的一面，所以这次离婚事件令冰表现得异常冷静，没有重蹈她当年的覆辙，这让孙桂娘倍感欣慰。由于她把自我投射到女儿身上，所以也间接通过女儿的成长完成了自我的成长，获得精神上的超脱和升华。

⁶⁵ 李忆著，《春秋流转》（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页79。

⁶⁶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349。

⁶⁷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139。

接下来，本文将讨论舜涓对明明的母爱。

艾瑞克·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他指出个体在每个人生阶段都会出现一个主要冲突或危机⁶⁸。他搭建了八个发展阶段，最后一个“成年晚期”的危机就是“自我整合对绝望”，如果个体没有解决前七个人生阶段的危机，留下人生缺憾，就会产生挫折感、绝望感和自卑感⁶⁹。舜涓是绝症病人，处于人生末期阶段，所以这个理论也可以用在她身上。舜涓私奔了十二年才回来见明明，其中主要动机是弥补长期对明明的伤害和人生缺憾。虽然她独立能干、事业有成，但她患了胃癌，已经时日不多了。她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是那么的孤独，所谓的业绩荣耀根本没有亲情来得重要，而女儿却被她不闻不问整整十二年，以至丧失了这段骨肉亲情，这种人生整合失败的挫折感驱使她回来马来西亚。舜涓此次与明明重逢，除了“希望在有生之日，可以好好地多看几眼她的女儿⁷⁰”外，也是想弥补当年残忍抛她而去的行为。她对明明始终都是卑微、客气、百般讨好，带有浓烈愧疚感的态度。

由于舜涓不尽母职长达十二年，所以她和明明的相处模式是相当客气、尴尬和生硬的。她没有陪伴明明长成少女，自然难以建立起孙桂娘对颜令冰和红莲那样的女性认同母爱情结。一般来说，社会要求父亲在外养家，母亲持家育儿，孩子对不同分工模式的家长会产生不一样的情感，所以舜涓在和明明交流时遇到困难。由于长期的母职缺席，她不理解明明的所思所想，个人喜好，对方也不愿意打开心扉，所以母女之间是工具性的交流内容，极少情感表露的表达性内容。舜涓不能像孙桂

⁶⁸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页328。

⁶⁹ [美] 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页329。

⁷⁰ 李忆著，《镜花三段》，页168。

娘那样和明明产生一种紧紧联系的亲密感、女性命运的特殊连结，也无法关注明明的“女性身份”建构，给她同为“女人”的教导，比如女儿的感情经历、衣着打扮、对男人的看法等等，这就使得她和明明每一次的相处只能停留在努力迁就和理解女儿的阶段。

此外，舜涓也无法把明明视作分身，把自我投射到女儿身上，她和明明相处时缺乏一体交融的幸福感，因为她对明明的爱来得太迟了，导致她必须把明明当作一个渴望建立亲密关系却不了解的客体看待。尽管舜涓后期还是很努力地在重建女性认同的母女关系，在衣装方面给她建议，聊些关于女人身材的问题，评价她的泳装等，但那失落的十四年还是使得母女俩之间无法建立起原初关系——也就是在基本的层次觉得彼此相像的原初认同⁷¹。舜涓发现自己终究无法理解明明，也黯然意识到她根本不需要这个所谓的母亲。所以，她选择放手，尽力成全明明的愿望，让她出国留学，同时为了不让明明悲伤，选择隐瞒病童，在明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医院死去，用自己纯粹且不含杂质的母爱默默守护她。

第二节 女儿

雀朵洛在《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一书以心理分析学理论探讨了母女的复杂关系，并重新解构和诠释了女儿的俄狄浦斯情结。本文将会运用

⁷¹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141。

她的理论挖掘颜令冰和明明对待母亲的心理。首先，由于孩子婴儿时期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所以女儿和儿子一样都有相似的恋母俄狄浦斯情结⁷²。这种爱起源于婴儿时期对母亲的天真自利式的自我本位之爱，无意识地要求母亲全心全意爱自己，关注自己⁷³。此外，母亲在女儿幼儿时期的陪伴，也会使母女俩之间拥有一体交融与原初亲密感，所以女儿将来会想要回返这种“沉静的幸福感”⁷⁴。对女孩来说，就像男孩一样，母亲都是原初的所爱客体，而这种依恋的性质是排他、竞争和嫉妒的⁷⁵。颜令冰和明明都展现出这种俄狄浦斯情结。

在探究颜令冰的俄狄浦斯情结前，得先分析父亲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一般来说，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相较男孩来说会持续较久，女孩希望能独占母亲的爱，但如果母亲无法满足自己，女孩就会产生爱恨交织的感觉，并转向父亲，寻求补偿和报复，但这其中仍保留对母亲的深刻爱意⁷⁶。颜令冰对母亲的爱恨交织感出自家庭环境的影响和母亲对她的态度。她爱母亲，母亲却对她很不耐烦，加上母亲经常找父亲吵架，导致家中常年不和，导致她产生愤恨的情绪，不满母亲违背了心中的母爱角色期待，也责怪母亲破坏家庭和谐，无法带给她幸福感，所以她愤而转向父亲，把他理想化和内化成一个站在相同阵线对抗母亲的可怜家长。然而，父亲作为一个情绪上和实际上都距离较远的客体，不足以打破她对母亲的依恋，所以颜令冰对母亲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法复制到父亲身上⁷⁷。她对母亲的依恋体现在她为

⁷²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123。

⁷³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77-78。

⁷⁴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99。

⁷⁵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47。

⁷⁶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162-165, 247, 261。

⁷⁷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165。

母亲向观音还愿的举止心酸不已，小时候母亲抱着病重的她拜观音求灵符，等她康复后仍年年还愿，这让她重新体验到母女之间的原初之爱。

在那之后，父亲与红莲姐有染，妹妹令冰病死，这些家庭惨剧令她开始怨恨起父亲，对他产生幻灭之感。相反的，母亲的忍辱负重和哀伤痛苦却被她看在眼里，她意识到母亲才是有意维护这个家的人。由于颜令冰内心保留着俄狄浦斯情结，所以她立马割裂原先对母亲的负面形象，迫不及待地内化及还原这个自己一直深爱着的伟大母亲形象。她找到大胆释放爱意的机会，不离不弃地陪伴和保护母亲，并信誓旦旦地向她承诺：“我一定不会让人欺负你的！”⁷⁸

当然，母亲也以慈爱温柔的态度回馈她的情感，母女心连心，相依为命，一起出走小镇，开始新生活。这种双向的情感互动，帮助母女重建原初亲密感和一体交融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回返婴儿时期母女情绪与生理的合一状态⁷⁹。这也是颜令冰没有被家破人亡的悲剧打到的原因，她从母亲身上获得充足的情绪回返资源，找到“沉静的幸福感⁸⁰”。

另一方面，明明的俄狄浦斯情结始终没有像颜令冰那样获得满足和回返的机会。她对母亲保有五种层次的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感。第一，她依恋母亲小时候对她的照顾；第二，她对母亲长达十二年的母职缺席产生愤怒、沮丧和被剥夺感；第三，她渴望母亲的亲密关系；第四，她无法原谅母亲对父亲的伤害；第五，她对母亲带有排他性的爱，看到母亲和别的男人拥肩搭背时，感觉母亲始终不是真正属

⁷⁸ 李忆著，《春秋流转》，页 165。

⁷⁹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55。

⁸⁰ [美]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99。

于她，产生了自己是局外人的被遗弃感。这五种复杂的全都导向同一个心理需求——那就是渴望回归早期母女俩之间的原初关系。

遗憾的是，明明还是难以打开心扉接受她，对她来说，十二年前的母亲形象早已被一个她不了解的女人取代了，她们是独立分开的个体，明明从这份关系中体验到无能为力的孤独感。儿时的母女关系随着母亲的抛弃而烟消云散，在她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重创，她始终觉得得不到足够的爱，终日郁郁不乐，心中有一大空缺。而早期保留的独占性俄狄浦斯之爱，使她在发现母亲与父亲以外的男人有暧昧的肢体接触时，难以自控地沮丧和痛苦。明明意识到，无论母亲再怎么讨好她，她们之间都有一种不属于彼此的疏离感。这残酷的事实促成她放弃了母女原初关系的重建，离乡留学美国。

除了原初关系之外，女孩也会对母亲产生一种女性认同和女性共同体意识。和男孩不一样，女孩会对母亲产生女性身份认同，从中习得她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明明虽然还是难以亲近母亲，却认可她的成功，相当敬佩她的成功，并潜意识将她当作现代女性楷模。首先，母亲精练能干、独立坚强。她一回到马来西亚，马上就风风火火开了一家时装店，一人打理生意。此外，母亲虽已四十四岁，却仍然装扮时尚、化妆明媚、风韵犹存、谈吐有礼、品味高级。明明把才貌双全的母亲当作一个成功女性的标准。她会把自己和母亲比较，为自己的呆板土气烦恼，有时也会进行前景投射，渴望自己和母亲一样优秀成功。

明明内心是很渴望可以建立起女性认同的母女关系的，这种情结体现在她期待母亲评价自己的三点式泳衣当中可见，她无意识地追求母亲的认可。不过，这种

倾慕关系却使得明明感觉母亲越发遥远。母亲在外打拼和磨练坚韧意志的过程她一概不知。由于母亲没有陪伴她长大，所以她觉得母亲很陌生，更像是老师和亲戚一类的理想人物模板，两人的关系始终有距离感。

颜令冰则不同，她在后期与母亲建立起持续久远的女性身份认同和女性共同体关系。她和母亲投靠单身的表姨妈，住在怡保的小山城里。表姨妈在一所学校经营食堂，妈妈做食堂帮手。表姨妈很尊重母亲，不提父亲的事，三个女人相依为命，母女心连心，摆脱男人的统治，建立起一种女性的反宇宙⁸¹。这种女性共同体意识也影响到颜令冰的认知判断，在遇到陈伦式前，她认为只要和母亲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好了。

后来，颜令冰和陈伦式结婚，生下一子，母亲感动得眼圈通红，两人之间的女性认同母女情结再度强化，甚至一直持续到颜令冰离婚后。离婚前，母亲从自己的过往经历中培养了对婚姻平衡的敏感，提醒女儿留意她婚姻危机的讯号。离婚后，母亲又对她不离不弃，帮她照顾儿子。由此可见，母亲和颜令冰之间始终保留着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意识。颜令冰也从母亲身上学到不执著和不任自己被情伤吞噬的坚韧意志，她在发现丈夫出轨后，很体面地提出离婚，保留尊严，并在母亲的支持下，很快就看开了。

这种健全的母爱也给予颜令冰向过去和解的力量。母亲理解她想见父亲的心，还未等她开口就允许她回去。母女心照不宣的默契提供她面对过去的力量。因此，

⁸¹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页 376。

颜令冰最终回到小镇看望父亲，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母亲，向颜医生、向过去、向自己和解。

第五章 结语

本文分别从已婚女人、单身女子、母亲和女儿四个社会身份划分李忆著笔下的女性角色，针对社会文化与人格影响因素，由内而外地剖析她们的心理，籍此探讨这些心理动力如何驱动她们做出某些行为决策。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每个女角色的至少可以套用十条以上的心理学名词去解读，那是因为李忆著的角色塑造手法相当讲究真实。她笔下的每个角色皆具备有迹可循的心理脉络，而心理脉络受外部事件的影响，会产生一定的转变，但又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她的小说里，人的心理是外部环境、内在人格及人类基本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举例来说，舜涓这个角色在小说里经历了四种成长阶段和身份转变：私奔女——独立女人——母亲。每个阶段都包含了特定事件的刺激造成的心理转变，这些心理状态影响她的人格和身份认同，而新的身份也随之影响她的心理和行动。

此文三章的研究焦点虽是分散的，但各章之间是相连的，这些相连处勾勒出影响女性心理的三条脉络，那就是社会责任、人格尊严和亲密关系。当然，这些要素其实是融会贯通的，只是各章突显的重点不一样而已。每个角色的心理研究基本从归属需要、自我建构和性别认同作出发点。

首先，第二章探讨了已婚女人对待妻职的态度，个体的身份建构深受社会角色的影响，但个体能不能适应这些角色又是一回事。一些女人之所以走向极端，正

是因为父权社会下的妻子身份本质上是镣铐，女人一旦步入婚姻，都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失调，因为妻职把她逼入空幻、枯燥和无意义的生存，陷入内在性的萎缩，而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又必须遵从社会规范，这种私人欲望和社会责任的冲突必定引发焦虑。玛妮和骆凤仪在父权观念和婚姻制度的压迫下，精神意志遭到异化、扭曲、分裂和物化，而她们的人格和精神缺陷也酿造成她们的人生悲剧。另一方面，胡真真和舜涓面对情人及家庭的“本我”与“超我”心理挣扎亦包含了婚姻义务、集体主义华人社会、焕发生命活力的私情以及家庭稳定的渴望的多重因素。

然而，没了妻职的束缚，女人也不会就此“解放”，因为健全的人格和尊严才是构成个体自我认可的基础，否则只会陷入自由的焦虑。杨瞬瞬、刘正美和舜涓之所以获得独立，主要是她们拥有安全型自尊、高度的自我效能和自我实现能力，才得以摆脱狭小的内在性命运，扩大人生抉择。与之相对，黛媚和丽娜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经历造成人格尊严的丧失，使她们陷入病态的孤独，成为父权社会的傀儡。由此可见，单身女子和妻子并非“自由”和“不自由”的非黑即白关系，女性若想获得人的尊严，本质上需要一个连结女性的社会角色和自我超越的社会结构，就像男人的父亲身份与他的主体性紧紧相连一样。

另外，女性角色的心理研究不一定得死板局限在个体心理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所以本文第四章便延伸至探讨母女情结，挖掘女性的共同体心理。孙桂娘在家变后对女儿产生女性认同和自我分身的母爱，颜令冰也通过母爱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拥有一个回返原初关系的稳定对象，彼此获得精神共鸣和成长。若个体拥有稳扎的亲密关系支持系统，就会发展出健全的心理，这

样就不容易被挫折击溃，女性间的反宇宙空间也具有治愈个体精神创伤的力量。另一方面，舜涓和明明错失重建正常母女关系的机会，最后只能在彼此深感缺憾的情感中分离。然而，能够感到遗憾，也正是因为母女间拥有爱，母女还是从这段短暂的关系中获得成长，默默守护对方，这种苦中带甜的结局深刻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复杂情感以及亲子关系在个体心灵成长极为重要的本质，李忆著在刻画母女关系的简朴脱俗高明之处亦来源于此。

其实李忆著小说里还有不少值得深度挖掘的女性角色，比如《死世界》的林月莱，只可惜碍于篇幅所限无法将之涵盖入文，也无法更深入地剖析其他角色的心理。然而，笔者相信本文还是能够成为李忆著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因为前人研究一般把重点放在社会大背景的隐喻，极少从微观视角运用科学理论剖析角色心理，而且通过四个角色类型的划分，本文还是可以让读者一窥李忆著的女性角色群像以及角色塑造手法。李忆著擅于刻绘复杂立体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格和行动都是结合了社会环境、个体经历、人格心理以及深层人类情感的逻辑去描写的，所以提供了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学科交叉融通的巨大心理解析空间，因此希望日后有更多学者可以深入研究相关课题。

(22268)

引用书目

一、书目

1. [美] 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第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2. 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 [美] 卡伦·霍妮著、冯川译，《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 [美] 兰西·雀朵洛著、张君玫译，《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
5. 林春美，〈李忆著的〈怨女〉与女作家的自觉与不觉〉，《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页 279-282。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6.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7. 李忆著，《李忆著文集》，福建：鹭江出版社，1995。
8. 李忆著，《痴男怨女》，吉隆坡：学人出版社，1990。
9. 李忆著，《梦海之滩》，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

10. 李忆著,《镜花三段》,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
11. 李忆著,《女人》,马六甲:学人出版社,1982。
12. 李忆著,《春秋流转》,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
13. [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著、王垒等译,《心理学与生活》(第19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14. [美]罗兰·米勒著、王伟平译,《亲密关系》(第6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15.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7. [美]亚伦·强森著、成令方、王秀云、游美惠、邱大昕、吴嘉苓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二、期刊论文

1.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著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页64-68。
2.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0-51。
3.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页41-48。

4.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著的小说〉，《小说评论》1992年第4期，页86-89。

三、学位论文

1. 田卓艳，《李忆著〈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和身份认同》，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8。

附录

李忆著小说出版书目

出版年份	书名	出版社
1982	《女人》	学人出版社
1990	《痴男怨女》	学人出版社
1995	《李忆著文集》	鹭江出版社
1996	《春秋流转》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1999	《镜花三段》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1999	《梦海之滩》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012	《遗梦之北》	釀出版

